



王国平 主编

南宋史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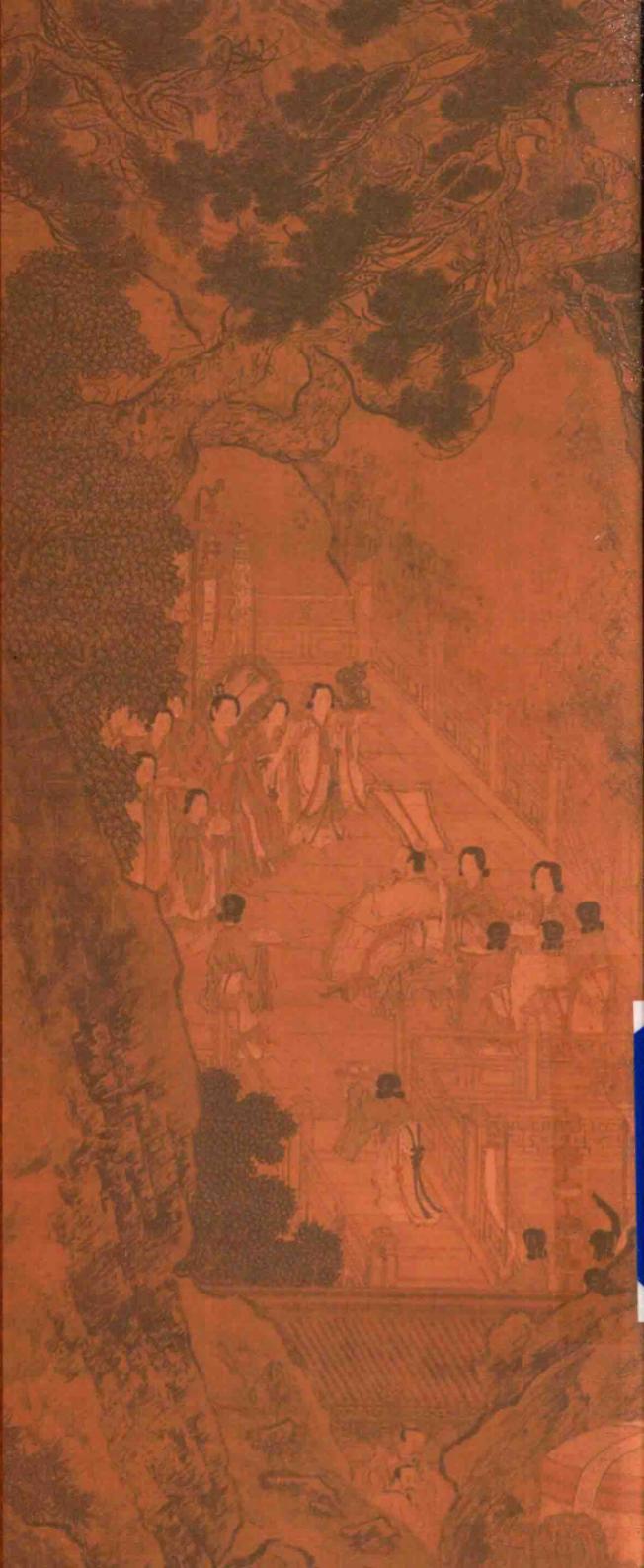
南宋全史

七

范立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国平 主编

南宋史研究丛书

范立舟 著

南宋全史

思想、文化、科技和社

目 录

第一章 南宋时期的教育与藏书.....	(1)
第一节 南宋的官学教育.....	(1)
一、国子监与太学.....	(2)
二、中央诸专门学校.....	(6)
三、地方州县学校.....	(8)
第二节 南宋的私学与社会教育.....	(11)
一、南宋的私学.....	(11)
二、南宋私学教学中的教材与社会教育.....	(15)
第三节 南宋的书院教育.....	(22)
一、南宋书院之兴盛.....	(22)
二、南宋书院与理学思潮的相互支撑.....	(25)
三、书院之办学理念及其现代启示.....	(34)
第四节 南宋藏书.....	(35)
一、官方藏书.....	(35)
二、民间藏书.....	(41)
第二章 南宋思想学术.....	(46)
第一节 胡宏、张栻及湖湘学派	(46)
一、胡宏思想特性.....	(47)

2 南宋全史(七) 思想、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卷上

二、张栻思想及其在湖湘学派中的地位	(49)
第二节 陆九渊及其心学	(52)
一、“心即理”	(52)
二、“发明本心”	(53)
三、心学的特点与价值	(56)
四、陆九渊思想的学术渊源	(60)
五、陆九渊的易学思想	(62)
第三节 “甬上四先生”的心学思想	(71)
一、杨简的心学思想特色	(72)
二、袁燮对陆九渊学说的修正	(77)
三、舒璘的“理心兼容”说	(82)
四、沈煥对心学的理解	(86)
第四节 吕祖谦的理心兼容学说	(90)
第五节 朱熹的理学思想	(94)
一、天理论	(94)
二、心性论	(96)
三、格物致知论	(98)
四、朱陆之争	(100)
五、南宋后期朱熹理学获得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102)
第六节 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	(105)
一、陈亮思想简析	(105)
二、永嘉学派和叶适思想	(109)
第三章 南宋的历史学	(115)
第一节 南宋的目录学成绩及其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的地位	(115)
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117)
二、尤袤《遂初堂书目》的历史文献学价值	(121)
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贡献	(123)

第二节 南宋的当代史编撰	(128)
一、编年体史籍	(128)
二、纪传体史籍《东都事略》	(137)
三、纪事本末体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	(144)
四、通鉴纲目体与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153)
五、作为城市史新体裁的《东京梦华录》	(158)
六、南宋的地方志	(164)
七、国史、实录和会要	(170)
八、丛书和类书	(174)
第三节 南宋历史学理念中的理学色彩	(175)
一、两宋理学家对历史学性质的反思	(176)
二、两宋理学家对历史学功能的界定	(188)
第四节 郑樵的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	(195)
第五节 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	(206)
第四章 南宋的文学	(212)
第一节 南宋诗作	(212)
一、陆游和“中兴四大诗人”	(213)
二、永嘉四灵、江湖诗派与其他诗人	(225)
第二节 南宋词作	(236)
一、李清照	(236)
二、辛弃疾	(239)
三、陆游	(242)
四、吴文英、张炎、周密以及晚宋词人	(244)
五、朱淑真及其他南宋女词人	(252)
第三节 《张协状元》与戏剧的起源	(255)
第五章 南宋社会文化与民间精神世界	(260)
第一节 宋代的士大夫文化	(260)

4 南宋全史(七) 思想、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活卷上

一、成就高尚人格的精神风貌.....	(262)
二、独善其身的个性追求.....	(265)
三、明体达用的功利主义主张.....	(268)
四、奔竞华靡之风.....	(270)
五、南宋士大夫文化与思想学术.....	(277)
第二节 南宋民间的精神世界.....	(279)
一、妈祖(天妃)信仰	(281)
二、关羽崇拜.....	(285)
三、门神与灶神信俗.....	(291)
四、土地与城隍崇拜.....	(293)
五、巫术信仰.....	(296)
第六章 南宋时期的宗教信仰.....	(303)
第一节 南宋禅宗的流派及其传播.....	(303)
一、两宋禅风和南宋士大夫禅悦之风.....	(304)
二、两宋禅宗宗派.....	(320)
第二节 南宋禅宗的形式及其思想特质.....	(331)
第三节 南宋世俗化佛教的源流和存在:净土信仰与南宋白莲教	(340)
一、南宋前净土信仰之嬗变与教理之开拓.....	(341)
二、宋代的民间宗教结社与净土信仰.....	(353)
三、佛教世俗化之进展与南宋白莲教的产生.....	(356)
第四节 道教内丹道的源流、发展与成熟	(362)
一、帝王之崇道.....	(363)
二、内丹道的源流和传承.....	(373)
三、北宋内丹道.....	(380)
四、南宋内丹道.....	(386)

目 录 5

第五节 南宋符箓道与净明道.....	(389)
一、新符箓道派.....	(390)
二、南宋净明道.....	(397)

第一章 南宋时期的教育与藏书

宋代以“重儒右文”著称于世。北宋期间便有庆历(1041—1049)、熙(宁)(元)丰(1068—1086)、崇宁(1102—1106)三次兴学运动^①。南宋虽然偏安江南，但在绍兴(1131—1162)、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文教隆兴，官私学校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一般而论，仁宗景祐(1034—1038)、庆历兴学之后，经过数次颇具规模的办学，逐步形成了中央以太学、国子监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相配合；地方以州县学为中心，私学、家学、书院相配合的全国性的系统的办学体系。南宋时，则是官学与书院并存，主导着教育事业在政府和民间的双向健康发展，有宋一代的教育呈现出多元纷呈的繁荣局面，对文化事业的促进和社会人才的培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南宋的官学教育

一些研究宋代教育史的学者，首先关注庆历教育事业的突然爆发以及

^① 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认为北宋共有四次由中央政府主持的大规模的兴学活动，除上述三次外，仁宗天圣(1023—1032)、景祐(1034—1038)年间也出现过大力办学的高潮。陈氏以为，后人之所以误以庆历为北宋兴学之始，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注意到太学的兴废而忽视了州郡学校的发展，造成太学与州县学同时建立的印象，给人以太学的振兴带动了州县学校兴盛的错觉，而实际情况恰好相反。说见该书第120—150页。

对整个宋代教育的深刻影响,他们从兴建学校的状况和教学理念以及太学与地方学校教师人才的繁盛和所培养人才的质量的大幅度提升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庆历兴学对宋代教育与文化的根本性的奠基作用^①。的确,无论从中央官学还是从地方官学的发展来看,庆历年间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

一、国子监与太学

宋初,国子监是当时唯一的中央学校,规定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太祖皇帝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先奉诏令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②。作为中央教育的最高学府,国子监融管理与教学双重职能于一体,在教育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但在草创阶段却显得落寞。国子监是当时唯一的中央官办学校,太学只是国子监下设的广文、太学、律学三馆之一。“广文教进士,太学教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律学馆教明律。”^③庆历四年(1044),太学从国子监三馆中正式分出,独立建校,“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④,由国家提供食宿,采用胡瑗的“湖州教学法”。胡瑗秉持“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所谓“体”,即儒家纲常名教的终极原理;所谓“用”,即治国安民的各种方法。“湖州教学法”主要是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因材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水利和历算等科。凡入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这种尝试,既使学生能领悟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宋代学风的转变,胡瑗起到关键作用。欧阳修就曾指出:

^① 参见(日)寺田刚《宋代教育史概说》,博文社1965年出版,第39—69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二《学校考三·太学》,中华书局1986年据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影印本,第395页。

^③ 脱脱:《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国子监》,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910页。

^④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57页。

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①

胡瑗的教育方法固然先进，但是太学的功能却仍然单一。太学并没有取士权，贡举考试时，“国子监发解试”和州府解试处于同等地位，太学生和国子监生只是以举人身份参加考试，录取后也不过是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神宗熙宁四年（1071），立太学“三舍法”，“太学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学，验所隶州公据，试补外舍，斋长谕月书其行艺于籍。行谓率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季终考于学谕，次学录，次正，次博士，后考于长貳。岁终会其高下，书于籍，以俟覆试，参验而序进之。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凡公试，初场经义，次场论策。试上舍，如省试法。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以俟殿试；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等，以俟省试”^②。这就是说，外舍生和内舍生每月考试经义或论、策一次，由学官自行出题，叫做私试；每年年底，朝廷派遣外官主持外舍生和内舍生的考试，称为公试。外舍生、内舍生若成绩优秀，可以依次升等，上舍生的考试视同省试，上等的上舍生可以直接授官，中等的上舍生可以“免省”，直接参加殿试；下等的上舍生可以“免解”，直接参加省试。至此，太学取得了部分的取士权，学校与官员任命有了直接的关联。徽宗崇宁三年（1104），太学生的人数也膨胀到3800人，国子监则

^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二五《胡先生墓表》，载《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排印本，第178页。袁征在《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特辟一章讲解胡瑗及其“湖州教学法”的特点与成效，认为宋代是中国教育史的转型时期，而胡瑗又是此一转型期的引领者。

^②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57页。关于宋神宗时代太学功能的大幅度演变，可参见李弘祺（Thomas H. C. Lee）：《宋神宗朝太学政策的两个阶段》，载氏著《宋代教育散论》，东升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出版。

停止招生，实际上被太学所取代。

南宋立国后，朝廷又想到要恢复中央官学，“建炎初，即行在置国子监，立博士二员，以随幸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绍兴八年，叶紲上书请建学，而廷臣皆以兵兴馈运为辞。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凡诸道住本州，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犯第三等以上罚，或不住学而曾两预释奠及齿于乡饮酒者，听充弟子员。每岁春秋两试之，旋命一岁一补，于是多士云集，至分场试之”^①。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以岳飞故宅(杭州小车桥东)为太学。后生员日益增加，太学不断扩建，规模逐渐宏阔壮丽。太学西侧为孔庙，门列二十四戟，中建大成殿，祀奉孔子，十哲配享；两庑彩绘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前代贤哲从祀^②。每年春、秋行释奠礼，由太常乐工奏乐。殿后有光尧石经阁，内奉宋高宗赵构和吴皇后手书《易》、《尚书》、《诗》、《春秋》、《论语》、《孟子》、《中庸》及宋孝宗赵睿御札等刻石。绍兴二十六年(1156)，宋高宗赵构又将所作《文宣王(孔子)赞》和《七十二贤赞》并《序》刻石，存于太学，作为太学生攻读经典的国家标准教科书^③。至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太学生人数已达1716人。

元代袁桷曾指出：“宋朝承唐之旧，而国学之制日隳。至于绍兴，国学愈

^①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69—3670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五《学校》：“高宗自南渡以来，复建太、武、宗三学于杭都。太学在纪家桥东，以岳鄂王第为之，规模宏阔，舍宇壮丽，学之西偏建大成殿，殿门外立二十四戟，大成殿以奉至圣文宣王，十哲配享，两庑彩画七十二贤，前朝贤士公卿诸像皆从祀，每岁春秋二丁，行释奠礼，命太常乐工数人用宫架乐歌《宣圣御赞》，赞曰：‘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式，古今之师。志则《春秋》，道由忠恕。贤于尧舜，日月共誉。惟时载雍，戢此武功。肃昭盛仪，海宇聿崇。’置学官，自祭酒、司业、丞、簿、正、录等共四十五员。学有崇化堂、首善阁、光尧石经之阁，奉高孝二帝宸书御制札，石刻于阁下，以墨本置于上堂之后。”参见《梦粱录》卷一五《学校》，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第122页。

^③ 南宋太学石经，是宋高宗赵构和皇后吴氏手书，刻成于绍兴十四年(1144)至十六年(1146)。南宋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赵睿在孔庙大成殿后建阁奉安，亲书匾曰：“光尧石经之阁”，置放石经，故南宋太学石经，也称为“光尧石经”。碑刻现存八十五石，其中有《周易》二石，《尚书》七石，《毛诗》十石，《中庸》一石，《春秋》四十八石，《论语》七石，《孟子》十石。保存于杭州文庙内。参见《南宋太学石经》，西泠印社2011年出版。相关研究可参见陈光熙、陈进《南宋石经考述》，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

废，虽名三学，而国学非真国子矣。当时布衣从公卿，牒补入国学，而真国子入学者，十无一二。”^①张邦炜认为，宋代的国子监有一个持续地逐渐地向太学转化的过程，最终国子监（国子学）与太学二学归一，回复到太学单轨制^②。庆历间，国子学下设有三馆，三馆的区别不是等级的不同，而是专业不同。“宋初国子监虽由三馆构成，但未见有学舍和学官。其原因在于三馆仅是名目上的存在，对国子监生则是根据各自所选应试科目，给予相应监牒。因为三馆制只是学籍簿上的区分。”^③庆历前就一直持续着国子学规模不断扩大，等级界限不断缩小的现象。到庆历大规模兴学后，太学独立建校并兴旺，国子监则成为掌管全国学校的总机构。熙宁变法时期，太学处于完全压倒国子学的地位，国子监生居然要附属太学而“升贡”^④。在机构设置上，国子学与太学就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机构组织，“今之学官，惟直讲、说书共八人，而无国子、太学、四门之别。”^⑤南宋时，国子学附属于太学，二学合一，太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立大学”^⑥。北宋时人称道“三学”，指的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南宋时人口中的“三学”则是指太学、武学和宗学。如“度宗咸淳二年正月，幸太学，谒先圣，礼成，推恩三学”^⑦。这里的三学就是太、武、宗学的统称。权相史嵩之“（淳祐）四年，遭父丧，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累赐手诏，遣中使趣行。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皆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⑧。又，“淳祐十二年（1252）六月，武学列札为同舍求棺木，京尹余太监晦差都辖院长伍

^①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国学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参见张邦炜、朱瑞熙《论宋代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载邓广铭、姬家驹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又载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③ （日）近藤一成：《宋初的国子监》，张永江译，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④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〇，中华书局1957年据1935年北平图书馆刊本影印本。

^⑤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五《议学校法》，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出版。

^⑥ 参见张其昀《南宋杭州之国立大学》，载《国风月刊》第8卷第9、10期合刊，1946年10月。

^⑦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72页。

^⑧ 《宋史》卷四一四《史嵩之传》，第12425—12426页。

作十四五人突入搔检，揭帛裂衣，暴露两日，斋众同太学、宗学伏阙上书。”^①南宋国子监完全成为单纯的教育行政机关，“专掌天下之学校”^②，国子监生就读于太学^③。

二、中央诸专门学校

前辈学者张其昀认为：“以现代眼光而论，南宋太学仅可称为文科大学，而含有一部分法科性质。在北宋晚期，虽曾先后设置律学、算学、画学、医学等科，但至南宋时，仍自大学分出，合并于专门研究机构。”^④的确，中央官学，除太学以外，在国子监和其他部门监管下还有一些专科性质的学校。如律学，“律学，国初置博士，掌授法律。熙宁六年（1072），始即国子监设学，置教授四员。凡命官、举人皆得入学，各处一斋。举人须得命官二人保任，先入学听读而后试补”^⑤。律学是宋代中央教习法律的专科学校。医学：宋初，医学隶属于太常寺，神宗时设置太医局，医学专科学校逐渐地发展起来，有学生300人，“设三科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崇宁间，改隶国子监，置博士、正、录各四员，分科教导，纠行规矩，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外舍二十。”“绍兴中，复置医学，以医师主之。”^⑥南宋后期，又恢复了太医局的建构，医学仍然归口太医局管理。武学：宋代武学，始于宋仁宗即位之初，“仁宗时，尝置武学，既而中辍。天圣八年（1030），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神宗熙宁五年（1072），枢密请建武

^① 俞文豹：《清夜录》，载陶宗仪撰《说郛》卷三八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据涵芬楼百卷本、明刻《说郛》一百二十卷本及《说郛续》四十六卷本汇集影印本。

^② 《梦粱录》卷九《诸监》，第69页。

^③ 张邦炜、朱瑞熙的《论宋代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分析了国子学并入太学的原因，而且还论证了国子学向太学演变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实际意义。参见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441—448页。关于南宋太学教育的组织机构、生源、升等和日常管理问题，还可以参见盛朗西《宋代的大学教育》，载《民铎》第7卷第2号，1926年3月；《宋代的大学教育（续）》，载《民铎》第7卷第5号，1926年9月。

^④ 张其昀：《南宋杭州之国立大学》，载《国风月刊》第8卷第9、10期合刊，1946年10月。

^⑤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73页。

^⑥ 同上书，第3689页。

学于武成王庙，以尚书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食本钱万缗。生员以百人为额，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①。南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重建武学，十年后，高宗在一次视察武学后，“见武学颓弊，因谕辅臣曰：‘文武一道也，今太学就绪，而武学几废，恐有遗才。’诏兵部讨论典故，参立新制。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分上、内、外三舍，学生额百人。置博士一员，以文臣有出身或武举高选人为之；学谕一员，以武举补官人为之”^②。从此武学步入正轨，为南宋国家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就指示：“武举本求将帅之材，今前名皆从军，以七年为限，则久在军中，谙练军政，他日可备委任。”宋代中央武学，是一种较为完善的军事人才培养机构，它有一系列招生、培养、管理、除官等制度，实际运行了两百余年。是中国教育史、军事史和制度史上的重大里程碑^③。算学：宋代中央教育机构的算学，始建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生员以二百一十人为额，许命官及庶人为之。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大观四年（1100），算学划归太史局管理。南渡以后，宋朝廷还是比较重视算学人才的培养的，“淳熙元年（1174）春，聚局生子弟试历算《崇天》、《宣明》、《大衍历》三经，取其通习者”。此后还多次举行算学考试，选拔算学人才。南宋能够出现秦九韶（约1202—约1261）和杨辉（1220—1280）这样的数学天才，确立起当时在世界领先的数学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书学：宋代中央的书学也建立于崇宁三年

①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79页。

② 同上书，第3683页。

③ 关于宋代的武学和武举制度的建构和运行以及对后世相关制度的影响，可以参见吴九龙、王菡《宋代武学武举制度考述》，载《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赵冬梅的《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出版）也有通俗但非常准确的解释。

(1104),初隶属于国子监,大观四年(1100)改隶于翰林院书艺局。“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可观为下。其三舍补试升降,略同算学法。”书学在中央教育系列中,虽然不占据主要的地位,但仍是中央教育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画学:宋代画学创立于徽宗崇宁三年(1104),大观四年(1100),改隶于翰林院图画局。宋代的画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绘画专科学校。“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①南宋山水画四大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画风或刚劲犀利,气魄雄伟,或刚劲简括,水墨淋漓,他们未必都是出身画学,但他们的成就,也凸显出南宋高水平的美术造诣以及画学所构筑的艺术高地对提升时代的总体艺术水准所作的贡献。

三、地方州县学校

宋代官学,在中央固然比较完备,在地方上也形成了一个周全的教育系统。与宋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较,宋代地方官学设学数量多,范围广,校舍建筑规模齐备,藏书楼兴建普遍,学生人数增加,教师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还建立了管理地方官学的专门行政机构。宋代州县学教育的发展,使得平民子弟接受教育的机会大为增加,进而呈现出了教育日渐普及的趋向。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诏许曲阜先圣庙立学,赐应天府书院额。州郡置学始此”^②。在此以后,一些有见识、有抱负的政治家在主管地方政

^①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85—3688页。

^②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七《真宗皇帝·建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79—1995年点校本)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一月辛巳朔,以应天府书院为府学,仍给田十顷”。应天府书院属于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地方的官学机构,非一般书院可比。

务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兴办地方官学,培育人才。如晏殊,“留守南京,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①。“宝元元年(1038),颍州守臣蔡齐请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庆历四年(1044),兴学后,各府、州、军、监都陆续建学,“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于是州郡不置学者鲜矣。又置教授,以三年为一任,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史于幕职州县官内荐教授,或本处举人举有德艺者充。”^②宋神宗时,更将地方官学的教授纳入朝廷命官的行列。经过熙宁四年(1071)、崇宁元年(1102)几次大规模兴学运动,州县各类学校遍布天下。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规定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有关制度与太学三舍法相同,各州、府学每年向太学“岁贡”,每州贡上舍生一人,内舍生二人,州内舍生免试为太学的外舍生,州上舍生先附太学外舍生学习,经考试中格升为太学内舍生,经三次考试还不能升内舍生,返回州学。徽宗崇宁元年(1102),又规定县学学生经选考升入州、府学;州、府学学生,每三年向太学输送一次,再经考试,上等者为太学上舍生,中等者为下等上舍生,下等者为内舍生,不入等的为外舍生。宣和三年(1121)罢州县学三舍法。北宋后期是州县学最盛时期,各路都设“提举学事司”,管辖一路学政。州县学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1109),北宋24路共有学生167622人,校舍95298楹;经费年收入钱3058872贯,支出2678787贯;粮食年收入640291斛,支出337944斛;校产中有“学田”115990顷,“房廊”155454楹^③。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不仅是空前的,在宋代也是绝后的。南宋初,州县学大多因战乱而停办,绍兴

^① 《居士集》卷二二《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载《欧阳修全集》,第161页。

^② 《文献通考》卷六三《职官考·教授》,第571页。

^③ 参见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邕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W. Chaffee)的统计,宋代政府掌管的地方州学前后有234所,县学51616所。但这个数字一定是不完备的,实际的学校数量远大于贾氏的这个统计数字。参见氏著《宋代科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出版,第202—203页。